在交流互鉴中拓展文明视野

听 海

温故知新 学而时习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无论是古代的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等,还是现在的亚洲文明、非洲文明、欧洲文明、美洲文明、大洋洲文明等,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出自《礼记·学记》,这句话道出治学之道:一个人闭门苦读,缺少同他人交流的机会,认知容易产生局限,视野难以走向开阔。站在人类文明演进的视角看,这个道理同样成立。任何一种文明,如果长期自我封闭、拒绝与外界对话,就容易造成认知固化、停滞不前;保持开放姿态,积极学习借鉴其他文明有益养分,才能持续获得生长活力。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人类文明的画卷是不同地域、不同族群在漫长岁月中彼此往来、相互启发而共同绘就的。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

回望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交流互鉴一直是其绵延五千多年未曾中断的重要特质。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中华文明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获得了丰富营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丝绸之路的开辟,遣隋遣唐使大批来华,法显、玄奘西行取经,郑和七下远洋,等等,都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事例。

回望古丝绸之路,它既是商道,也是文明交流的纽带。地处丝路要道的敦煌,融汇了印度佛教艺术、中亚纹样与中原文脉,成就独有的石窟艺术。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东罗马、伊斯兰琉璃器,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都是文明互鉴的生动见证。中华文明的丰厚积淀,就是在同其他文明交流切磋、择善吸纳的过程中不断生长的。

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各国各民族都应该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当然,学习借鉴不是简单拿来、全盘照搬,而是基于平等基础上的对话、理性视角下的吸收以及立足本土的转化创新。文明学习借鉴,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讲求兼收并蓄,但兼收并蓄不是囫囵吞枣、莫衷一是,而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倡导文明交流互鉴,不能丢掉自身文化立场,不能脱离民族文化根脉。要守住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在同其他文明的对话中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品格,不断增强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交流借鉴的目的,在于滋养发展自身文明,同时丰富人类共有的精神宝库。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这句古语深刻昭示,文明发展离不开交流互鉴。只有秉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立场,以开放胸襟看待多样世界文明,理性吸收借鉴有益成果,扎根自身文化传统推陈出新,才能让人类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让地方戏融入文旅 新场景的形态和路径

孙佳希

游客远赴异地,寻访的不只是山水风物,更是一方水土滋养的乡土人情与生活样貌。地方戏所保存的唱腔、身段与故事,正是这种生活记忆的活态载体。长期以来,地方戏演出主要依托专业剧场,观众需购票入场、专程观看,看戏与日常生活之间始终隔着一道“门槛”。随着文旅融合的推进,古城、老街、文博场馆与历史建筑开始为地方戏提供常态化演出空间:章丘梆子走进明水古城,越剧《新龙门客栈》把观众请进“客栈”,一些古戏楼、会馆也重新响起锣鼓。空间一变,剧目形态、观演关系和建筑功能也随之调整,地方戏能否借助文旅新场景重新赢得观众,关键不在于简单“嵌入”,而在于场景与剧种是否对应、剧目能否适度改编、观演距离能否拉近、历史建筑能否活化利用。笔者结合国内有代表性的实践案例,考察地方戏融入文旅新场景的主要形态与转化路径。

地方戏融入文旅新场景的主要形态

景区驻演场景 景区驻演让地方戏回到了剧种生长的土壤。济南章丘的明水古城将省级非遗章丘梆子安排在三味戏楼全天分时段演出。淄博周村是五音戏的重要发源地,古商城内的古戏台在周末下午固定上演五音戏折子戏。游客沿老街游览,行至戏楼附近即可听到本地唱腔。唱腔与街巷出自同一片土地,耳畔的戏与眼前的建筑相互印证,景区的地方辨识度随之增强。对这类地方戏曲小剧种而言,景区驻演更为青年戏曲演员提供了稳定的登台机会。

城市街区场景 城市街区也在成为地方戏的日常演出场所。西安易俗社文化街区常年安排秦腔演出,市民下班后、游客游览途中都可以入内听戏。豫剧名家李树建自2024年起在上海豫园“海上梨园”小剧场驻场演出,这一剧种由此在上海老城厢有了固定观众。也有城市尝试把黄梅戏等剧种引入商圈与老街,用时长较短的演出降低市民接触戏曲的门槛。看完演出后,不少观众会在附近就餐或逛夜市,演出对周边夜间消费形成带动。与景区相比,街区更容易吸引本地居民反复前来,演出随之融入居民的休闲生活。街区演出点位较为分散,市民在购物、散步的间隙便能看上一段戏,看戏能够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

文旅新场景中地方戏的发展转化路径

剧目内容的轻量化改编 根据不同场景搭建,演出内容需随之调整。整本大戏篇幅较长,难以适应游客边走边看的游览节奏。在豫园驻演的李树建豫剧“忠孝节义”四部曲均改编成沉浸式小剧场版本,由讲述人串联剧情、引出唱段,篇幅压缩而筋骨仍在。沾化渔鼓戏新编小剧场剧目《今夕何夕》由3名演员撑起全剧,对场地要求不高,县级剧团也有能力长期排演。泰安大宋不夜城复建了勾栏瓦肆,水浒题材的实景演出已经落地,但街巷演艺仍以情景剧和角色扮演为主,山东梆子、大平调等剧种擅长的水浒戏尚未进入其中。剧团不妨从中选取情节集中的片段,改编成适合街巷演出的短剧,使场景与剧种题材对应。改编过程中唱腔与表演程式应保持剧种规范,不能以牺牲剧种筋骨为代价,小剧场版本一旦只剩唱段拼贴,地方戏便可能从“艺术”退为“节目”。

观演距离的拉近 剧目篇幅压缩之后,观演关系也可以重新组织。传统剧场以台口分隔演员与观众,观众坐在固定座位上远距离观看。杭州蝴蝶剧场的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把剧场空间整体布置成客栈,环绕式座席消解了舞台边界,演员在观众身边演唱、开打,位置不同,看到的场面也各异。上海沪剧院把《日出》移入汾阳路一座百年老洋房演出,演员在客厅与楼梯之间穿行,观众跟随剧情转换视线。近距离观看让观众更容易看清演员的身段与表情,甚至平时不常看戏的观众也因此愿意购票入场。两部作品的唱腔与身段均遵循剧种规范,变化集中在空间组织上,为地方戏适应和改造演出场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观演距离的拉近并不等于观演关系的深化,沉浸式空间若只停留在形式包装上,观众与剧种之间仍可能隔着一层“布景”。

历史建筑的活化利用 除新建与改造的剧场外,历史建筑同样可为地方戏提供演出空间。各地留存的古戏楼与会馆原本就曾是演戏的场所,目前多数只作为文物静态展示。广西南宁戏曲博物馆设在清代会馆新会书院内,院内常态化上演粤剧、邕剧,展柜里陈列着戏服与老剧本,参观者看完展览就可坐下听戏,对剧种历史的了解更加直观。北京正乙祠戏楼交由北方昆曲剧院修缮与运营,2022年重新开业,古戏楼恢复了日常演出。菏泽城隍庙戏楼与单县山西会馆戏楼等同样具备演出条件,可以参照南宁与北京的做法安排固定演出。管理方可在不改变建筑原貌的前提下增设简易座椅与音响设备,让古戏楼恢复演出功能。古戏楼恢复演出功能固然可喜,但文物保护逻辑与演出运营逻辑并不天然一致,需要更细致的制度安排,否则“活化”容易变成“耗用”。

让地方戏融入文旅新场景中,不应只是演出场次之频、游客流量之多,更应是剧种生命之“活”。地方戏融入文旅新场景,不只是空间转移,更是剧种规定性与场景逻辑之间的一场持续角力。“活”的底线是剧种不能变成场景的附庸。地方戏若不能在唱腔、剧目与观演关系中保持自身的规定性,再热闹的文旅场景也只是一时的舞台,而非长久的土壤。从剧种的特点出发,选择真正与剧种气质相合的场景形式,地方戏才能更好地被看见,被听懂。

(作者系山东艺术学院戏曲与曲艺学院副教授)

媒介赋能民族打击乐文化传播路径研究

刘 梦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深入推进与数字媒介技术的快速迭代,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提供了全新的技术环境与传播生态。民族打击乐作为植根民俗生活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的艺术形态,承载着不同地域的文化记忆、民俗传统与审美表达,是中华传统音乐文化体系中极具辨识度与感染力的组成部分。随着数字媒介的全面普及与传播形态的持续创新,民族打击乐的传播场域从线下展演空间向开放的数字公共空间延伸,为传统艺术形态的活化传承与跨圈层传播注入了新的可能性,也为民族文化符号的当代阐释与大众传播提供了多元实践路径。

主体赋能:构建多元协同的专业化传播矩阵

传播主体的资源禀赋、能力结构与协同机制,是决定文化传播系统运行效能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核心基础。对于深耕传统艺术领域的非遗传承人与专业演奏群体,可为其提供与媒介素养相关的系统性培训,例如2025年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面向全省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举办的专项培训班,将数字传播逻辑、新媒体内容生产实操、数字文化知识产权保护纳入分层设计的课程体系之中。该项目推动深耕传统演奏领域的从业者逐步建立数字传播的完整认知框架,将自身长年积淀的锣鼓演奏技艺与民俗文化积累转化为适配短视频、直播等多元数字传播场景的文化产品,依托主流互联网平台构建具有鲜明岭南文化辨识度的传播账号与艺术IP,实现了传统鼓乐艺术从线下展演到线上开放式长效传播的路径拓展与价值转化。除了专业演奏群体,对于广泛分布于民间的音乐爱好者与内容创作群体而言,开放的创作交流与资源共享平台的搭建能够激发其二次创作的内在活力,引导其结合当代大众审美取向与流行文化元素对民族打击乐进行多样化新演绎,从而充分挖掘民间创作蕴藏的传播潜力与大众亲和力。

内容赋能:打造分层递进的优质内容体系

文化传播内容的层级化构建与文化内核的深度挖掘,是民族打击乐在数字媒介环境中实现文化价值有效传递与受众圈层持续拓展的重要依托。不同维度的内容形态对应差异化的传播目标与受众群体,共同构成梯度清晰、功能互补的内容供给体系。

其一,挖掘文化内核,打造精品内容。基于长期的民俗田野调查的资料与音乐学术研究成果,梳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打击乐的历史起源脉络、民俗生活功能与文化象征内涵,将蕴藏于乐器形制、传统曲目与演奏仪式中的文化故事,转化为纪录片、专题文化科普与经典曲目深度赏析等内容,在完整呈现艺术发展脉络的同时,传递其背后承载的集体文化记忆与民族审美传统,为具备一定艺术认知基础的受众群体提供兼具学术严谨性与文化厚重感的精品内容。

其二,适配碎片化传播,打造轻量化内容。提炼民族打击乐极具冲击力的视听表现与鲜明的艺术特色,打造时长适配移动传播场景的演奏技巧片段展示、经典旋律创意改编与不同音乐品类跨界合奏等轻量化内容形态,贴合大众日常碎片化的信息接收节奏与休闲文化需求,推动传统艺术突破小众圈层限制进入更广泛的公共文化视野。

其三,鼓励内容创新,推广更多原创内容。以短视频为例,民族打击乐的短视频传播多停留于经典曲目片段的重复演绎与演奏技巧的表层展示,在信息密度极高的短视频信息流中同质化内容难以形成持续的受众吸引力。对此应当强化原创性内容的推流,或可依托主流短视频平台发起主题原创征集活动,引导创作者结合当代生活语境与多元音乐风格对民族打击乐进行曲目改编与场景化创作,对兼具艺术质感与文化表达深度的原创作品给予专项扶持,推动实现传播内容从复刻模仿向原创力作的层级升级。

渠道赋能:实现圈层突破与深化文化认同

在新媒体环境中受众作为传播链路的延伸节点,其圈层分布特征、内容参与程度与文化认同深度,直接决定了文化传播的最终覆盖效能与价值转化成果,深刻影响民族音乐文化的扩散范围、接受程度以及文化意义的现实落地。传播主体需基于民族打击乐文化传播需求,针对专业爱好者、普通大众、青少年群体等不同受众,打造差异化传播内容与渠道,提升传播精准度。如针对浙江本地青少年群体,选取植根江南水乡民俗语境,集仪式性、观赏性于一体的浙东锣鼓、舟山渔民锣鼓等具有本土代表性民族打击乐经典段落,将其拆解为适配中小学课堂时长与青少年认知节奏的轻量化研学单元,嵌入地方特色音乐课程的拓展实践板块。同时,依托浙江省内的非遗保护中心与地方音乐院校联合搭建的线上数字研学端口,设置节奏互动闯关、虚拟乐器敲击、民俗知识延展等低门槛交互模块,弱化专业技法训练自带的厚重感与艺术距离感,在循序渐进的趣味化参与过程中完成民族音乐文化的早期启蒙与长期潜在受众培育。

民族打击乐的当代传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元媒介则为其突破传统传播局限、融入当代文化生态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与路径选择。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演进与文化传播生态的不断更新,民族打击乐的文化传播将在主体、内容与渠道的协同赋能中释放更持久的生命力,成为继承民族文化基因、彰显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

(作者单位:浙江音乐学院国乐系)

文化景观视域下的殷墟:

文明叙事与地方传承实践

屈如兰

殷墟作为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是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绵延发展的核心文化地标。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文化工程,既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开辟了创新实践路径,也承担着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使命。笔者以文化景观概念为分析支撑,立足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语境,重点考察殷墟遗址空间重构与文化价值的创新表达,梳理殷商文明的叙事逻辑与现代传播路径,进而探究遗址保护、文旅融合与地方文化传承的实践路径,以期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文明活化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文化景观视域下的分析框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在遗产项下,将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纳入文化遗产范畴,《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进一步对文化景观作出专门界定,为理解遗址空间的意义提供了分析视角。据此,笔者尝试提出“物质景观—媒介景观—场域景观”三层分析框架:物质景观是文明叙事的物质根基,媒介景观承担着符号解码与话语重构功能,场域景观指向遗产与地方生活的活态共生,涵盖社区参与和文旅融合两个面向。比如,殷墟文化景观呈现出深厚的“层积”特征:新石器时代至商代的文化序列以后冈三叠层(仰韶—龙山—商)为典型,中商时期的洹北商城与晚商的宫殿宗庙区、王陵区构成都城遗存主体,还叠置着近代工业遗产如1903年开工生产的广益纱厂与1958年始建的安阳钢铁厂。数千年的文明印记在同一区域毗邻共存。

景观符号转译: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文明叙事建构

殷墟的草木土石、甲骨残片、宫殿基址,本身就是承载文明信息的符号。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即是完成景观符号的转译,将深埋地下的商代遗存及其背后艰深难懂的文明信息,通过系统的阐释与编码,转化为大众可读懂、可共情的叙事内容,构建起立体完整的中华文明叙事体系。

物质景观:遗址本体作为文明叙事的物质载体

遗址所涵盖的宫殿宗庙基址、王陵墓葬群、手工业作坊遗存,并非孤立的考古点位,而是商代都城社会运行留下的空间印记。散落的青铜器、玉器残片真实再现了晚商时期的工艺水准与先民精神世界。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始终以维护遗产真实性与完整性为核心准则,以科学的符号转译夯实文明叙事的物质基础。一方面,严格恪守真实性保护理念,杜绝盲目复建仿古建筑,最大限度留存遗址真实风貌。对裸露夯土基址、规整考古探方的过度人工包装予以摒弃,以质朴真实的遗产景观直面公众,使参观者沉浸式体验商代先民的生活、劳作与祭祀图景,让静态文物转化为承载文明记忆的叙事舞台。另一方面,真实性保护并非放任不管,而应秉持最小干预原则,规范建设防护设施、步道与解说标识系统,依托权威考古研究成果充实解说、客观阐释历史,实现活态保护与精准叙事的有机统一。

媒介景观:展陈阐释重构文明叙事话语

倘若将遗址视作文明叙事的物质骨架,展陈阐释所建构的媒介景观便承担着填充血肉、赋予意义的功能,推动历史符号的解码与再转译。商代文字、礼制、社会体系距离当代生活十分遥远,游客很难仅凭夯土遗址读懂殷商文明。因此,博物馆展厅、数字展项、科普导览、专题研学等媒介景观,通过将专业考古语言转化为大众传播话语,承担文明叙事转化的功能。

其一,殷墟博物馆新馆是全景式展现商文明的国家重大专题博物馆,跳出单纯文物陈列模式,按照商代社会脉络组织展陈,转向对商代政治、经济、信仰、文字系统的整体性阐释。甲骨专题展区结合实物、拓片与动画演示,解析甲骨文造字逻辑,讲述汉字起源,让参观者理解汉字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

其二,依托数字技术延展媒介景观边界,以三维复原技术还原商代宫殿风貌,以沉浸式影像重现甲骨占卜场景,将静态文物转化为动态历史场景,使游客不仅了解殷墟一地的历史,更能感知中华早期文明的辉煌成就,增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

场域活态延续: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地方传承实践

文化景观并非孤立的文物保护区,而是人与遗产长期共生的活态场域。殷墟遗址保护区占地29.47平方公里,覆盖安阳市3个区、11个乡(街道)及66个村(社区),保护区内已实施四级网格化管理,形成公安、文保、协管、网格员共同参与的群防群治格局。推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应坚持活态保护理念,兼顾遗址保护与地方发展,引导遗址周边社区参与遗产传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实现遗产景观与地方生活共生,让古老文明扎根乡土。

社区参与:民众融入遗产保护传承实践

本土居民是殷墟文化景观最长久的在场见证者,更是殷商文明活态传承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主体。长期以来,受宣传不足、参与机制缺失等因素影响,遗址周边部分民众存在认知偏差,将遗产保护单纯视为政府部门与专业机构的专属职责,缺乏主动参与、自觉守护的责任意识,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遗产保护的精细化、长效化推进。因此,关键在于推动周边民众由“被保护的对象”转变为遗产保护传承的责任主体。

其一,相关部门应常态化开展殷墟文化宣讲、考古普及与文物保护普法活动,推动文化宣传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摒弃单向灌输的刻板模式,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增进居民对遗址价值的认知。

其二,应健全基层参与机制,搭建常态化参与平台,引导居民有序参与遗址巡查、生态环境保护与秩序维护,弥补专业力量有限、基层管护薄弱的短板。

其三,本土居民深谙地方风土人情,应依托这一在地优势,系统梳理散落于民间的古老传说、民俗记忆与口述史料,留存殷商文化在地流传的真实印记,推动其活态传承。

文旅融合:地方生活与遗产景观共生发展

文旅融合是激活遗产当代价值、带动地方发展的重要途径,能让文物古迹走出静态陈列,融入日常生活,其中安阳的做法颇具代表性。

其一,文化资源整合转化。系统梳理地方文脉,整合零散而受忽视的文化资源,经创造性转化,使其成为彰显城市精神的景观地标。其中,广益纱厂旧址与殷墟博物馆隔洹河相望,如今已活化升级为殷墟考古文旅小镇,成为商文明与近代工业文明叠合对话的空间见证。安钢厂区与遗址的空间关系如何处理、工业遗产与商都景观的叙事如何衔接,则是场域景观建构中待解的课题。这种“层积”式的文化资源,为安阳的城市文化品牌增添了独特维度。

其二,营造沉浸式文化体验。依托地方民俗与历史底蕴,顺应游客需求打造沉浸式场景,完善公共服务、提升从业人员素养,能使游客切身感受文化魅力。以殷墟博物馆为核心,将殷墟景区、洹河夜游与考古文旅小镇连点成片,先后推出数字演艺和实景演出,“大邑商”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名片。

其三,以数字技术赋能文旅升级。传统展陈多为单一静态,难以充分呈现遗产魅力。借助智能技术优化文旅场景,以数字展示、实景演绎等方式让静态遗产动态呈现、立体可感,既丰富了产品供给,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注入了新动能。当然,遗址环境承载力、业态商业化程度与展示真实性之间存在张力,近代工业遗产的叙事衔接尚待破题。如何平衡游客规模与参观品质、展示利用与遗产守护,仍是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需要持续回应的命题。

以文化景观为载体,通过物质景观的真实性保护、媒介景观的符号转译与场域景观的活态延续,让沉睡三千多年的殷商遗址走进公众、可感可知。这种坚持保护优先、活态传承、社区共建、文旅赋能的发展路径,为大遗址保护与地方发展如何共生提供了示范路径。从文化景观视域审视,殷墟的实践表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关键,在于构建物质遗存、符号阐释与地方生活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使遗产空间成为连接国家宏大叙事与个体文化体验的意义纽带。立足新时代,唯有持续深耕遗产活化、厚植在地文脉、创新传播范式,方能让殷商文化薪火相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作者系郑州大学智慧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讲师、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本文系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大遗址保护背景下的殷墟遗址区空间演变机制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22YJCZH139)